

类型教育背景下 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及治理

——基于组织同形理论视角

杜宇虹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初教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 科研一直是高职院校常规的制度化活动。随着高职院校对科研重视程度的提高,科研“学术漂移”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科研导向重数量轻质量、科研定位“学术漂移”、科研评价标准趋同,这与国家关于高职教育的类型定位相悖。依照组织同形理论,高职院校科研在竞争同形和制度同形机制共同驱动下形成了“学术漂移”。为治理科研“学术漂移”,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以类型教育为根本,明确高职院校科研定位;以协同治理为主题,发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科研中的作用;以破“五唯”为抓手,优化科研评价体系;以市场需求和服务教学为导向,贯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渠道。

关键词: 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竞争同形;制度同形

DOI:10.16209/j.cnki.cust.2023.04.018

科研自高职院校诞生以来一直作为常规的制度化活动,为高职院校保障“高等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看到高职院校科研总体处于偏低的水平,离真正意义上的科研功能相距甚远,同时还看到高职院校科研“唯项目、唯课题、唯论文、唯专著、唯专利”等“五唯”问题,表现出在研究内容、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等方面与研究型大学基础性研究相似的学术性特征。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界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类型教育的提出,为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应对这种范式的改变,高职院校的科研如何做出相应的调整? 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职业教育的科学技术研究”“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新时代高职院校从规模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科研是高职院校突破办学瓶颈的重要手段,唯有“研究”才能真正发展出具有标杆意义的高职院校^[1]。从类型教育身份出发,高职院校科学技术研究应不同于普通高校。普通高校的科研以科学研究为主、技术研究为辅。尤其研究型大学科研定位是生产科学知识,以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为主旨。普通高等教育的科研体现出一定高度的学术性^[2]。高职院校必须明晰自身固有的类型属性,科研应该有自身的发展道路,体现应用型特征,避免落入科研“学术漂移”的陷阱^[3]。高职院校如何避免科研“学术漂移”,做好类型教育背景下的高职院校科研? 本文运用组织同形理论,探求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机制,提出高职院校科研治理对策,以助推高职院校科研契合类型教育定位高质量发展,提高

高职院校办学质量。

一、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表现形式

1972年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ls)最早将“学术漂移”界定为“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按照更接近于‘大学’的方式来确定活动实践的一种趋势”^[4]。国内学者认为,“学术漂移”是“高校背离原有的定位,寻求不断向上发展的运动”^[5]、“高等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的超越自身特点的,以重视学术、追求更好地位为典型特征的倾向”^[6]。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学术漂移”是高职院校科研偏离高职教育类型定位,不断寻求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的一种活动实践,其本质是重科学研究、轻技术研究,是高职院校科研逐渐偏离定位导致与研究型大学科研趋同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看,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虽然具有一个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属性,但在其内部形态、任务、功能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等方面都应完全不同^[7],即以研究科学知识为导向的研究型大学和以技术研究为导向的高职院校科研存在差异性,高职院校科研只有基于自身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进行合理的定位,建立起契合类型教育的科研模式,才能有效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因此,厘清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表现形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从当前科研行为看,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突出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科研导向重数量轻质量

研究型大学发展态势和资源配置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在其达成的社会使命和功能的途径中科研影响力和科研成果贡献

率更大,在此影响下,高职院校制定与研究型大学类似的科研制度,激励教师做科研,科研评价也像研究型大学一样将教师的项目、课题、论文、著作等的级别和数量进行量化,以此作为科研考核和职称评聘的依据,虽然这种“计量式”科研评价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机会主义、克服主观片面性和人情关系,但过度重视科研评价的量化,导致高职院校盲目追求科研数量和速度,对科研成果数量和生产速度的追求超过了对科研质量的追求。注重科研数量的达标而不注重科研是否具有独特的学术创见是高职院校科研绩效考核一贯默认的做法。在科研导向重数量轻质量背景下,高职院校科研出现蒸蒸日上的局面,查阅教育部官网《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近五年全国高等专科学校科研成果及技术转让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近五年全国高等专科学校科研成果及技术转让情况

项目名称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学术 论文	总数(篇)	55834	60887	62934	64938	65911
	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篇)	1800	2142	2473	2929	3450
专利	专利授权数(项)	16022	18589	24834	27567	40962
	专利出售数(项)	269	449	507	727	1410
	专利出售总金额(千元)	6567	15789	24168	33955	27827
技术转让实际收入(千元)		25996	49957	55448	32905	57084

注:2017—2020年高等专科学校数分别是826、929、947、1000、1014

从表中看出全国高等专科学校学术论文总数逐年增长,2021年比2017年增长了118.04%,但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论文占比非常低,平均为4.12%。有学者对高职院校教师在国内CSSCI来源期刊和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教育科研文章统计分析,得出“高职院校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教育科研成果很难、高职院校普通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更为困难”的结论^[8]。高职院校教师很难发表国内外高质量论文,在这种情况下高职院校跟上研究型大学科研步伐是不现实的。

专利授权数(项)逐年增加,2021年比2017年增长了255.66%,但专利出售占比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五年平均数为2.63%。技术转让实际收入逐年增长,以数据最好的2021年为例,2021年比2017年增长了219.59%,但2021年专利出售总金额与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总和只占科研经费的1.92%,科研成果与技术转让相对科研经费投入存在断崖式落差,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都为0项。专利出售数1410项,平均每校1.4项,专利出售占比3.44%,专利出售总金额与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总和平均每校8.37万元,科研成

果及技术转让率低下。科研“学术漂移”造成高职院校科研数量逐步增加,但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质量未从得到提升。

(二)科研定位“学术漂移”

高职教育是产教融合为内核的一种类型教育,与产业、行业、企业紧密相连,但做什么样的科研,高职院校一直处于模仿状态,模仿研究型大学科研模式、结构和行动方式,力图像研究型大学一样在项目、课题、论文数量和级别上获得提升与突破,以此作为提高学校办学实力和知名度的突破口。加上高职院校教师大多是从研究型大学毕业而来,使得高职院校围绕项目、课题、论文、著作等开展科研,这样做更容易、更快捷生产科研成果,于是高职院校逐渐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压缩版”的科研模式,科研以研究型大学科研为发展标杆,追求生产科学知识的研究,这样的科研定位消解了科研应该体现类型教育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区域性特色,直接后果是使高职教育与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规格和办学模式趋同,影响高等教育多样化生态系统的构建,不利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特色和功能的充分发挥,难以满足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对人才多元化需求,影响人才的有效调节,也容易形成高等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导致高等教育系统治理和社会发展低效。

(三)科研评价标准趋同

科研评价标准是科研评价的方向、规范和尺寸。高职院校以产教融合为生命线,对教师的岗位职责和科研应用型特征进行深入剖析,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科研评价标准。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以技术技能积累和创新为核心,对教师的科研评价应以教师的职责为出发点。然而,高职院校教学活动成效和科研成果在传播度和显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社会对高职教育质量质疑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科研质量不高。为了改变这种印象,也为了获得政府、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对高职教育质量高度认可,高职院校无一例外都在科研评价上做功夫,在教师职称评聘中赋值科研较高的权重,促使教师努力去做科研。查阅湖北省12所高职院校教师职称晋升政策,可以发现教学比重小于或等于科研产出比重,有的学校将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数量作为评定副教授和教授的前置条件,鲜闻教学教得好的教师在职称评聘上占优,教学在教师职称评聘中基本上成了一个次要因素。这些做法与研究型大学相似,以项目、课题、论文、著作、专利为计量单位的科研评价标准趋同。

二、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形成的机制

目前,学术界对“学术漂移”形成的机制有不同的阐述。分析和解释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的形成机制,使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理论等组织同形理论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组织同形理论最早由霍利(Hawley)提出,他认为组织面临着相同的外部环境时,这个外部环境会约束个别个体与其他个体逐渐趋于一致的同质化过程^[9]。依据这个理论,高职院校

科研“学术漂移”本质就是不断模仿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活动而趋于一致的同质化过程。鲍威尔(Walter W. Powell)和迪马吉奥(Paul J. DiMaggio)认为组织同形具有竞争同形和制度同形两种作用机制,前者是在“技术环境”中运行,后者是在“制度环境”中运行^[10]。

(一)竞争同形

组织生态学源于达尔文物种选择理论,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很大程度受“技术环境”因素影响。摩根(Gareth Morgan)认为组织生存依赖资源的获得以及与不同类型组织竞争的能力^[11]。依据这个观点,高职院校依赖环境发展有两个命题:第一,高职院校为了生存需要从环境中获得足够和持续的资源;第二,当资源稀缺时,高职院校必须与其他组织竞争才能获得足够和持续的资源。因此,竞争同形是指在高等教育场域内,组织间为了争夺有限资源而展开竞争,优胜劣汰,推动组织采取与竞争对手相同或相似的回应,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组织逐渐趋于同形。

按照组织生态学理论的辨析,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同处于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同质化的环境中,研究型大学在生态系统形成了竞争的垄断性稳定结构,在办学经费、生源、师资、科研、就业竞争等方面均处于优势地位,而高职院校明显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中处于结构层次的底端,获取的教育资源极其有限。面对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高职院校为了避免被剔除的厄运,竭力模仿研究型大学科研的模式、结构和行为,极大地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赢得资源和相应的地位。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同形,形成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

(二)制度同形

迈耶(John W. Meyer)和罗恩(Brian Rowan)作为组织社会学领域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强调大的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塑造和影响,认为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都打上了制度的烙印,组织是制度化的组织^[12]。高职院校是一个制度性组织,其组织生存的基础是与制度环境相一致,满足合法性要求,这也是高职院校获取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制度同形是制度性组织为了获取政治权力和制度合法性而产生的同形。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可以理解为高职院校科研对照研究型大学科研活动形塑制度同形的演进过程。鲍威尔(Walter W. Powell)和迪马吉奥(Paul J. DiMaggio)认为制度同形包括强制、模仿和规范三种作用机制^[10]。

1. 强制同形

强制同形是指在组织间相互依赖的场域中,自身强大力量的组织向一个组织所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压力,试图去影响这个组织的行为。在某种情形下,强制同形可以认为是对政策、法令的一种直接反应。从根本上说,制度同形来源于强制性权

力^[13]。目前,高职院校科研权利结构是链式权利结构,结构的顶端是高职院校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是科研政策、制度、方向、规则制定、科研资源配置的施动者,对结构中端的高职院校和底端的教师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行政权力,通过行政手段向下发布科研命令和科研绩效考核,决定着高职院校科研资源配置和科研项目的申报。结构中端的高职院校既是高职院校内部科研政策、制度、规则、激励制定和考核的施动者,也是承接上级行政权力的受动者,为了提升上级行政权力对学校科研绩效考核的成绩,高职院校将科研任务下达给每一个教师,促使教师完成年度科研考核目标。结构底端的教师是典型强制性行政权力受动者,通过项目、课题、论文、专利、著作和教材编写、技术转让等具体科研活动来完成科研任务。这种链式权利结构的科研管理,通过压力传导的方式激励教师做科研。

在链式权利结构中强制性行政权力过大,边界模糊,对学术权力干预过多或者忽视。行政权力泛化,导致学术权力弱化,这是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一直存在的突出问题^[14]。在行政权力泛化的背景下,高职院校通过制定政策、制度和规则,将教师的科研绩效与教师的切实利益捆绑在一起,教师只有完成了科研绩效,才能获得当年的科研绩效奖励和职称评聘科研绩效分值,如果教师没有完成相应科研绩效考核,必然会影响教师的职称晋升,也必然影响教师的经济收入,如果在一定周期内没有通过规定的科研绩效考核,教师面临职称低聘或者解聘的风险。在当前职称评审权下放到高职院校的情况下,行政权力泛化的作用更加强化,教师为了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和经济效益,不得不参与竞争去追逐具体科研任务,于是政策、法律法规和资源配置制度构成了推动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的强制性力量。

2. 模仿同形

模仿同形是指组织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时,通过模仿其他成熟组织而降低失败风险,使自身组织与成熟组织趋于同形。模仿是对照成熟的组织来塑造自身成长的有效途径,高校自身属性的不确定性是模仿形成的根本原因^[15]。科恩(Michael D. Cohen)和马奇(James G. March)认为目标模糊和技术的不确定是教育组织的两个显著特征^[16]。

首先,高职院校科研目标模糊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科研定位缺乏清晰的认识。与研究型大学相比较,高职院校无论办学历史、文化底蕴,还是办学经验,都处在初级阶段,对自身办学规律和特点还在探索之中,要想在高职院校内部制定出一套得到普遍认同且具有一致性的科研目标,或者是高职院校内部通过科研活动推演出一套普遍认同的科研目标,既不现实,也是极其困难的。

其次,高职院校自诞生以来科研水平总体偏低,开展科研活动时所采用的技术是不确定的,在科研活动中具体采用的方

法、技巧和程序是很难明确地表述和界定,唯有通过提高科研的数量和速度来展现科研能力。高职院校内部甚至是外界人士很难理解这些方法、技巧和程序,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也难以对高职院校科研活动的产出准确地衡量和评价,高职院校也就失去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土壤。

第三,高职院校直接模仿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模式,能够给高职院校科研带来一些捷径,可以规避探索新的科研模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同时高职院校自身科研目标不清晰,也缺乏顶层设计,唯有模仿那些更有声望、更加成功的大学科研所采用的模式、结构与行为,才能增加自身的合法性与存活概率。

3. 规范同形

规范同形源于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主要是指社会规范带来的一种普遍认同的共享观念、共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这些信念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即使没有任何明显的技术优势,组织也会遵从它们以获得公众的支持和信任。”^[17]首先,人事筛选是规范同形的一个重要机制^[18]。各级政府科研管理领导、各级职业教育科研机构研究员和研究型大学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教授绝大多数来自于研究型大学,这些人主张高职院校搞科研,自然会带来“规范同形”。同时高职院校的师资大多来自于研究型大学,会倾向于把自己所经历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活动移植到自己的科研中来。客观上,这两种人事筛选导致的规范同形,是造成今日高职院校科研定位“向研究型大学看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随着教师群体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教师对自己与所从事学科专业之间的联系,要比他们与所在高职院校以及院系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学术情有独钟,而不是对教学感兴趣,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功更容易获得职称上的晋升和被同行认可。教师群体职业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促进了知识的专业化,当科研成果被越来越多期刊发表或转化为社会服务收入,教师在学校会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话语权,一旦他们拥有权力定义学校科研的“规范性”,就会影响学校科研政策、制度和行为,其结果会导致学校科研“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

第三,高职院校职业和专业培训以及行业企业推行的规范性规则,会使同一专业的教师具有相似性,教师个体间可以相互代替,教师群体的一致性会超越学校多样的控制方式,进而影响学校行为,导致专业和科研规范同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科研培训已经成为新常态,教师自然而然会将科研培训学到的对科研的认识与以往科研经验一起考虑来进行新的科研。这样,教师逐渐地会有了相近的科研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科研规范同形就产生了。

概而言之,从组织同形理论的视角来看,高职院校科研“学

术漂移”是组织域内竞争同形和制度同形综合作用的结果,竞争同形着眼组织的“技术环境”,制度同形着眼组织的“制度环境”,前者强调效率,后者强调合法性。因此,高职院校科研追求效率而形成的竞争同形与追求合法性而形成的制度同形共同推动了“学术漂移”的产生。

三、新时期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治理对策

深刻认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表现形式和形成的机制,找出内在规律性,无疑能为新时代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的治理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以类型教育为根本,明确高职院校科研定位

依据组织生态学理论解释逻辑,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保持活力、实现新陈代谢的关键。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是高等教育系统保持活力、实现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高职院校和研究型大学是不同的教育类型,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追求办学质量和效率的同时,聚焦自身合法性存在的基础,准确进行科学的定位,避免不必要的竞争。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目标模糊和技术的不确定导致自身组织模仿成熟组织,治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就是要明晰高职院校科研定位。英国著名的思想家怀特海(Whitehead)指出“现代职业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19]。高职教育是以产教融合为核心,技术性研究是高职院校类型教育的典型特征。高职教育的科研就是要围绕技术性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弱化对生产科学知识的科研,强化对技术性的实用型问题研究,建立符合类型教育属性的科研逻辑体系:以服务产业、行业、企业和教学为研究对象,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载体,以生产技术知识和教师实践性知识为研究内容,以调查、评估、产品或技术开发、调试及设计、行动中反思等研究方法开展科研^[20]。

(二)以协同治理为主题,发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科研中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过大的强制性行政权力,使高职院校处在外部竞争激烈和资源短缺的双重制约困境中,加剧了高职院校对教师科研评价进行量化。要消解竞争同形和制度同形给高职院校教师科研带来的危机,必然要求政府从一元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一种特定的公私协同方式,强调系统内部多元主体自发地有序联系,以实现系统的整体效应^[21]。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系统内部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其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同等重要,都是高职院校科研协同治理的关键力量^[22]。协同治理,必须理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自身的角色、责任、权力边界和权力运行方式,权力过大的行政权力让渡学术权力应该享有的权力,建立权力相互制约而又和谐运行机制,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治理中发挥作用。

一是发挥政府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从制度层面构建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的隔离机制。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遏制科研“学术漂移”的基本保障。在类型教育背景下,政府在立法上给予高职教育科研与研究型大学科研“不同类型但等价等值”的平等法律地位,加强其“规制合法性”,明确科研“应用逻辑”的中心地位,形成高职院校科研“应用逻辑”与研究型大学科研“学术逻辑”同等重要的“双中心”均衡结构,从政策、法律法规上构建起有效的隔离机制,规避竞争同形导致的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职院校处于的弱势地位,推动高职院校发展道路回归类型教育定位,科研运行在“应用逻辑”的有效范围内。

二是整合学术资源,构建类型特色鲜明的学术权力结构。学术资源是学术权力的支撑和载体,没有学术资源支撑的学术权力是虚置体^[23]。重组、提升校内学术组织,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系统,并与行政权力组织系统形成健康的权力生态。校内学术组织积极外联,与校外科研组织包括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吸收行业、企业的科研骨干,聘请研究型大学长期研究职业教育的专家教授为顾问,组成学术共同体,参与校内学术事务,组建产学研科研团队,共同开发科研项目,形成科研资源、经费和成果共享。

三是增强学术权威,提升科研能力。要提升学术权力在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内涵建设的作用,必须增强学术权力的话语权。增强学术权威重要的是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学术共同体、科研团队聚集学术力量、聚合人才,在行动中开展科研活动,能有效提升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另外,在高职院校营造一种崇尚学术、热爱科研的良好氛围,熏陶教师对学术权力的尊重和追随,鼓励教师热爱科研,自觉献身科研,为高职内涵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三)以破“五唯”为抓手,优化科研评价体系

从组织同形理论的视角来看,组织面临“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技术环境”注重科研的效率,科研可量化的结果带来科研的效率和目标的实现,促使高职院校注重科研的数量和速度而不是质量。“制度环境”影响和塑造高职院校科研制度。科研评价制度包括科研考核机制、科研评价指标和评价细则等,这些都与教师的职称评聘、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影响教师项目与课题申报、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社的选择。科研制度不仅激发教师注重科研的数量和速度,也刺激教师模仿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行为。竞争同形和制度同形带来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导致科研“五唯”痼疾愈演愈烈。治理科研“学术漂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类型教育特色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引导高职院校科研回归本位,促进高职院校良性发展和特色发展。

一是科研评价标准突出高职院校科研“应用逻辑”。科研

评价标准体现对生产技术知识和教学实践性知识的评价,将高职院校科研“应用逻辑”置于重要地位。科研评价标准坚持科研质量为前提条件,减少科研数量导向的做法,增加科研成果质量、创新能力和教学质量、科研成果转化及社会服务的贡献指标及其权重。科研评价标准要体现产教融合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满足政府、企业、学校、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丰富科研评价指标,真正体现科研成果能够促进产教融合。

二是建立科研分类评价。高职院校分类设置教师工作岗位,教师的专业技术岗位可设置为:教学、教学与科研、科研与社会服务三类岗位,按照高职院校科研定位,从生产技术知识和教师实践性知识分别进行科研评价。根据岗位类型改革科研绩效考核和职称评聘等规章制度,让热爱教学的教师从科研评价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幸福感,在人才培养和文化遗产中体现价值。有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做贡献。

三是建立多元主体评价。专业的科研评价是科学有效的科研评价基础,也是高职院校遏制科研“学术漂移”的基础。将科研评价和职称评价交给学术共同体,真正实现学术评价自主^[24],同时吸纳“双师型”教师参与科研评价,给予“双师型”教师重点关注。虚心接受企业和服务对象的意见,注重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评价。

(四)以市场需求和服务教学为导向,贯通科研成果转化渠道

以市场需求和服务教学为导向,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企业的现实生产力,反哺教学,是治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成效的具体体现。推动科研成果转化、治理科研“学术漂移”需要从高职院校自身条件出发,探索有别于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路径。

一是立足市场需求和服务教学,科研以生成技术性和教师实践性知识为研究内容,技术性知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社会经济需求,与中小微企业联合解决技术难题、工艺难题和技术攻关,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比如为当地企业和社区提供调查、咨询和决策。教师实践性知识围绕学校治理、教育教学、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合作办学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将科研成果向教学质量和教学资源转化,比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教学比赛和技能比赛、教材、教学资源库等。

二是组建高职院校科研成果转化组织架构,联合政府科技局、技术交易所、行业协会、社会科技成果转化中间商、风险投资公司,协同开展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积极主动参加各级科技类展会,寻求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合作的机会。

三是探索学校、教师与企业实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形

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科研成果转化的产业化。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使教师获得相应的收益、企业获得技术成果和先进产品,提高教师和企业参与科研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四是利用产业学院、企业学院和校中厂的场地、设备、仪器进行科研硬件平台建设,建设成高水平高质量的技术与产品研究实验中心,为技术攻关、产品试验和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硬件条件。缺乏硬件条件是制约高职院校开展科研的一个重要因素,深化产教融合、加大资金投入是破解科研硬件条件不足的重要措施。

四、结语

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具有同构性,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依据组织同形理论,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都处在高等教育场域,属于竞争性非营利社会性组织,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的同构性,决定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具有一定合理性、必然性和内在规律性,恰当适度的科研“学术漂移”对保障高职院校的“高等性”具有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高职院校与研究型大学属于不同教育类型,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会导致与研究型大学科研趋同、多样化水平不断降低的消极不良后果。

治理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整体、系统的战略思考,唯有厘清其表现形式并不断深入挖掘其发生机制,才能找到治理之策。使用组织同形理论辨析高职院校科研“学术漂移”形成的深层次机制,可以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不仅是为了找到高职院校科研与研究型大学科研趋同发展的症结所在,更是为了规避不同教育类型多样化水平不断降低、组织之间同质化倾向不断加剧等问题出现,推动高职院校科研健康可持续性发展。本文针对性提出的治理之策,其用意是规范和约束高职院校科研行为,强化高职院校科研的“应用逻辑”,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教学和社会,使之形成类型教育的高职院校科研场域。

作者简介:杜宇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初教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语言文字。

参考文献:

[1] 徐国庆.“研究型”是建设高水平高职的突破口[N].中国青年报,2019-01-14(05).

[2] 陈悦,岳芸竹.高职院校科研的发展脉络、价值内涵与实施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2(20):96-101.

[3] 朱芝洲,蔡文兰,李静.类型教育视角下高职院校的“学术漂移”及治理——基于组织同形理论视角[J].职教论坛,2019(7):6-11.

[4] Burgess T.The Shape of Higher Education[M].London:

Cornmarket Press,1972:7-49.

[5] 聂永成,董泽芳.新建本科院校的“学术漂移”趋向:现状、成因及其抑制——基于对91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现状的实证调查[J].现代大学教育,2017(1):105-110.

[6] 唐晓玲,徐辉.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漂移:内涵阐释、理论基础与研究进展[J].高教探索,2016(9):5-9+28.

[7] 曹如军.制度创新与制度逻辑——新制度主义视野中地方高校的制度变革[J].高教探索,2007(5):5-8.

[8] 国卉男,董奇,张咪.高职院校教育科研的现状及其问题分析——基于在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成果的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18,39(4):34-38.

[9] Hawley A H.Urban Society:An Ecological Approach [M].New York:Wiley,1981.

[10] 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68-86.

[11] 摩根.组织[M].金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23-24.

[12] 王宾齐.高校内部组织绩效评价类型分析——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教育科学,2011(2):65-70.

[13] 高申春.人性辉煌之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24.

[14] 郝天聪,石伟平.高职院校的科研锦标赛:表现形式、形成机制及改革建议[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11):66-72.

[15] 司俊峰,唐玉光.高等教育“学术漂移”现象的动因探析——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9):38-44.

[16] Cohen M D, March J G.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2,17(1):1-25.

[17] 斯科特,戴维斯.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的视角[M].高俊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96,298.

[18] 王建华.从中国式大学到大学的中国模式[J].现代大学教育,2008(1):21-27.

[19] 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96-97.

[20] 郝天聪,石伟平.知识论视角下的高职院校科研定位探析[J].江苏高教,2021(6):25-30.

[21] 徐芳芳.基于协同治理的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2(2):158-164.

[22] 李子云,童寒川.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高职教育三维共治研究[J].中国高校科技,2021(9):35-40.

[23] 刘颖.高职院校学术权力的现状及优化举措[J].教育与职业,2016(16):31-34.

[24] 付八军.高校“五唯”:实质、缘起与治理[J].浙江社会科学,2020(2):90-94+108+158.